

论唐代后期藩镇对漕运的保障

李志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要] 安史之乱爆发后,安史叛军迅即占领大河南北,以及长安和洛阳等广大地区。漕运线路的安危,时有可虞。为此,沿途藩镇对漕运进行了保障工作,使得江淮等地物资,源源不断输至中央,支援了中央的平叛战争。安史之乱以后,一定时期内,因漕运线路经由的部分区域,仍然受到叛镇的控制或威胁。所以,保障漕运线路的安全,依然是相关藩镇的重要任务。唐后期,藩镇对漕运线路保障的基本得力,有效地延续了唐王朝的统治。

[关键词] 唐代;藩镇;漕运;保障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73(2014)05-0060-06

自清赵翼《廿二史札记》谈到:“唐之官制,莫不善于节度使”^[1]始,研究唐代藩镇的论著,多侧重强调其损害中央集权之消极方面。安史乱之前,藩镇主要集中于边疆地区。安史之乱爆发后,出于平叛的需要,藩镇制度在内地迅速扩展。安史之乱平定后,藩镇林立的局面依然得以维持。此因藩镇制度并非一无是处,而是顺应了时代的需要。唐后期,藩镇对维护和保障漕运线路的作用显著,从而起到维护中央统治的作用。

关于唐后期的漕运,史念海先生《三门峡与古代漕运》认为,三门峡是历代关东西漕运的枢纽,是漕粮运输的必经之路。并详论了为解决关中粮食问题,秦汉隋唐历朝所实施的各种解决办法^{[2][35-47]}。潘镛先生《中晚唐漕运史略》主要论述了唐人利用自然水道,在中晚唐时期实施漕运的情况,及其对唐王朝经济、政治的积极作用,并认为中晚唐时期的漕运与唐王朝的兴衰息息相关^[3]。吴立余先生《略论元和初期李巽的盐法漕运改革》认为,元和初李巽对当时已遭到严重破坏的盐法漕运进行了改革,之后,提高了盐铁收入,扩大了漕运成果,不仅从经济上削弱了藩镇,而且支持和推动了宪宗朝的平叛事业,使中央强化了对东南财政权的控制^[4]。关于唐后期漕运的论著还有很多,在此不能一一论述。前贤关于中晚唐时期漕运的论著,加深了对唐

后期政治经济联系的认识。本文试以唐后期藩镇与漕运的关系为着眼点,阐述在保障漕运方面,藩镇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从而起到了维护唐后期政治统治的作用。藩镇的存在及其积极作用的发挥,反映了安史乱后,唐廷对战后秩序重建所取得的成绩。

安史之乱以后,中原地区藩镇林立,加之屯守重兵,难以稳定向中央贡献。随着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藩镇屯兵又较少,得以有余力向中央贡献。为了保证京畿物质需求,唐廷历来重视转漕东南粮物。关于漕运的特点,吴琦先生曾指出三点:第一,漕运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水路转运,而是特指朝廷的水上转运,即官家水道之运输;第二,漕运是朝廷通过行政手段自上而下的粮物征调,而非各地自下而上的粮物朝贡;第三,漕运是统一王朝的粮物运输,只有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方可确保这种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常年物质运输,也只有中央政权才需要这种源源不断的粮食供应^[5]。

本文认为,因唐后期藩镇林立的格局的形成,漕运经由地区,时有战乱或遭战火之威胁,漕运因此时断时续或转由他道,因而受到很大影响。为尽可能保证漕路畅通,势必需要沿途藩镇予以保障。在唐后期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相关藩镇对漕运线路的保障基本得力,大大缓解了唐廷对于财货的需

[收稿日期] 2014-06-10

[作者简介] 李志刚(1984—),男,河南信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博士后,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隋唐史的研究。

要,对维护唐后期的中央统治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一、安史之乱爆发后藩镇对漕运的保障

安史之乱爆发后,因大河南北陷入战火,洛阳丢失后,漕运路绝。王夫之《读通鉴论》记:“当其时,贼据幽冀,陷两都,山东虽未尽失而隔绝不通,蜀赋既寡,又限以剑门栈道之险,所可资以赡军者唯江淮”^[6]。陈寅恪先生亦曾指出:“唐代自安史乱后,长安政权之得以继续维持,除文化势力外,仅恃东南八道财赋之供给。至黄巢之乱既将此东南区域之经济几全加破坏,复断绝汴路、运河之交通,而奉长安文化为中心、仰东南财赋以存立之政治集团,遂不得不土崩瓦解。大唐帝国之形式及实质,均于是告终矣”^[7]。当时之人,亦有类似看法,如吕温《故太子少保韦府君神道碑》记:“天宝之后,中原释耒,辇越而衣,漕而食”^{[8][4745]}。

唐后期,唐廷依靠江淮财赋,故保护漕运线路至关重要。据此,杜希德先生将唐代几个重要区域,进行了分类:“这些关键区域的第一个当然是京师的关中道,那里的资源虽然减缩,但它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仍是至高无上的。第二个关键区是西北的边境区,它是掩护京师使之避免帝国面临的最大外来威胁的盾牌。第三个是长江淮河流域,这一区域有迅速扩大的生产力、增长的人口和繁荣的商业,因此已成为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第四个是运河地带,它包括那些从南方运输税收所必经的几个镇”^[9]。安史之乱的爆发,关中、大河南北等悉为战区,经济遭受严重破坏。此后中央赖以维持的经济基地,转由江淮等南方诸镇承担。因此保卫漕运来源和经由地带,是唐后期相关藩镇的重要任务之一。

将南方财赋迅速转运至抗敌前线,开辟一条新漕路势在必行。时“江、淮奏请贡献之蜀、之灵武者,皆自襄阳取上津路抵扶风,道路无壅”^{[10][2504]}。开辟一条从江淮经襄阳,最后到达关中的、完整的财赋运输线路,另外保证这条生命线的安全和畅通,都需要集结藩镇的力量方能解决,这是单个州郡力所难及的。因此为保证东南财赋的顺利运输,有必要在沿线地区设置藩镇,或藉助藩镇的力量予以保护。

安史乱后,漕运线上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艰巨挑战。如所周知,自天宝以后,土地兼并日益加剧,加之官府搜刮,小民难以生存,户口大量流散,导致租税日臻减少,地方官府更加紧搜刮,如此造成了恶性循环。伟大诗人杜甫所作《石壕吏》、柳宗元所作《捕蛇者说》,都反映了安史乱后地方官府搜刮之

急迫,小民生存之艰难。安史之乱爆发后,大量难民又从中原逃往南方,其流离失所者多沦为盗贼,以劫掠为生。

如两浙地处两江一湖交汇之地,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下,参以官府横征暴敛,于地方治理上又难以触及,致“中原大乱,江淮多盗”^{[11][5164]}。至德年间“吴郡晋陵江东海陵诸界,已有草窃屯聚,居于洲岛,而新安郡负山洞之阻,为害特甚”^{[8][5121]}。宝应年间“相聚山泽为群盗,州县不能制”^{[12][7105]}。唐后期长江沿线藩镇辖区内江贼活动猖獗^{[13][168]},且祸害范围甚广。为此,江西、鄂岳、两浙、宣歙、淮南等南方诸镇,采取了相关措施,保护境内航运安全:“今若令宣、润、洪、鄂各一百人,淮南四百人,择少健者为之主将。仍于本界江岸创立营壁,拣择精锐,牢为舟棹,昼夜上下。江中有兵,安有乌合蚁聚之辈敢议攻劫”。即由宣歙、浙西、江西、鄂岳、淮南等镇,联合打击江贼。当时国家依靠东南赋税,为维护财税地的治安和漕路安全关系重大:“今西北边,御未来之寇,备向化之戎,长倾东南物产,供百万口”。且打击江贼,可祛三害,收三利:“人不冤死,去一害也;乡间获安,去二害也;每擒一私茶贼,搜求财货,私茶尽黜,去三害也。收到三利:商旅通流,万货不乏,获一利也;乡间安堵,狴犴空虚,获二利也;撷茶之饶,尽入公室,获三利也”。并且当时打击江贼有很多成功案例,证明其具有可行性。如江西观察使裴谊收降贼帅陈璠,“署以军中职名,委以江湖之任。自后廉察,悉皆委任。至今陈璠每出彭蠡湖口,领徒东下,商船百数,随璠行止”^{[13][168]}。

又自乾元元年起,两浙连续三年大饥,民众饿死无数。上元、宝应年间,江淮再次遭遇旱灾,继之以瘟疫。“大旱,三吴饥甚,人相食。明年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为之空虚。由是道路积骨,相支撑枕籍者,弥二千里,《春秋》已来不书”^{[11][4003]}。但官府并未因此放松对江淮的赋敛,“时天下饥谨,转钩者南自江淮,西自并汾,舟车相继”,“(上元中)敕江淮堰壤商旅牵船过处,准斛斗纳钱,谓之棣程”^[14]。迫于战争的需要,即使遇到大灾之年,唐廷对灾民的赋税依然难以减免。搜刮严急,自然会造成民乱。为此,保护漕运线路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安史叛军攻陷洛阳后,立即与唐廷展开了对漕运线路控制权的争夺。叛军屡攻睢阳,企图切断漕运通道,进而占据江淮;又南攻襄城,企图阻扼汉水通道。这两条运道,都是当时唐王朝的生命线^[15]。幸有睢阳张巡、许远和鲁炅等誓死抵御,使中原地区不至彻底沦陷。张巡死守睢阳,也从一个侧面表

明了，面对外来冲击时，单个州郡的力量太弱，只有依赖藩镇，才可勉强与叛军作一较量。如此才能将南方诸镇物资，源源输入中央。当时江南财赋转运西北的路线，《通鉴》记“以江淮租庸市轻货，溯江、汉而上至洋川”，然后由褒斜道“陆运至扶风以助军”^{[12]7001}。唐廷据此转运资粮，接济河西、陇右、朔方等镇军队，最终平定了叛军。

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虽勉强弭平，但唐后期中央政府所面对的内忧外患，并未因是衰减。大河南北诸镇，中央并未完全掌控，经由中原地区的漕运线路时有可虞。其关系唐廷死生存亡，中央势必要绝对掌控这条线路，为此拉开了诸镇护卫漕运的大幕。如大历十一年（776）李灵曜据汴宋叛，汴水受阻，忠武镇陈州刺史陈克开通陈颖运道，利用古鸿沟旧渠，漕船由淮溯颍、蔡水而上，绕开了汴渠。建中时，成德、魏博、淄青、幽州四镇同叛，中央一面抽调禁军进讨，一面派精兵武装护航。不久，淮西李希烈屡欲切断运河与江汉通道，危急关头，江西节度使李皋转战数千里，保护饷道，“江汉依皋为固”^{[16]3580}。元和中，淮西之役中，淄青李师道“烧河阴漕院钱三十万缗，米数万斛，仓数余区”^{[16]5992}。宪宗于宣武镇置淮颖水运使，将扬子院漕米自淮阴西入颍水，抵郾城，以馈诸军，“士饱而歌，马腾于槽”^[17]。在粮响充足的情况下，最终平定淮西叛乱。

二、唐后期藩镇对漕运的保障

我们知道，武宁镇徐泗二州为漕运要津，又毗邻河朔藩镇，成为护卫漕运的重要地带。广德二年（764），刘晏受命改革漕运，采用“分段交卸，依次进发”办法，“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16]1365}。就扬州漕船入汴而言，徐泗两州实当关键枢纽地位。建中时，田悦、李纳、梁崇义相继作乱，李、田扼守徐州涡口，致淮运断绝。梁崇义霸占襄邓二州后，江汉运路亦告受阻。两路漕运皆绝，关中处于恐慌状态。为此，江淮水路转运使杜佑曾建议别治运道，幸而淄青李纳将李洧以徐州归朝，江淮运道复通，暂时缓和了中央的物资供应危机。

唐廷中央一直在努力确保徐泗二州的控制权。而武宁镇的存在，较好地弥补了汴宋、淮南间护卫漕运的空白。中原漕运的两个关键要地，分别是徐州以南的埇桥和汴州。在防遏河朔的同时，武宁镇起到了保护漕运的作用。建中二年（781），“李正巳反，屯兵埇桥。江淮漕船积千余，不敢踰涡口。李泌建言：‘东南漕自淮达诸汴，徐之埇桥为江淮计’”^{[10]3441}。

口，请以建封帅徐，”^{[10]3441}。东南漕运一度梗阻，及“李纳将李洧以徐州降”^{[16]183}，汴水才得以重新打通。为缓解徐州地段的护漕压力，建中三年从李泌之请，德宗以徐州为中心，组建了武宁镇，命张建封为徐泗镇帅，以护卫漕运。有鉴于建中时漕运艰阻的现状，德宗还京后，为稳固江淮运道，派重兵守卫徐、汴州，确保淮上遭运。贞元四年（788），又派寿州濠州都团练使张建封代替“年少不习兵事”的高明应镇徐州，扼制淄青，使运路畅通无阻：“江淮漕运以甬桥为咽喉，地属徐州，邻于李纳，刺史高明应年少不习事，若李纳一旦复有异图，窃据徐州，是失江淮也，国用何从而致！请徙寿、庐、濠都团练使张建封镇徐州，割濠、泗以隶之；复以庐、寿归淮南，则淄青惕息而运路常通，江淮安矣”^{[12]7509}。贞元十六年，徐泗濠团练使张建封死，徐州兵变，劫建封子愔“令知军府事”，唐廷以淮南节度杜佑“兼徐泗濠节度使，使讨之。佑大具舟舰，遣牙将孟准为前锋；济淮而败，佑不敢进。泗州刺史张伾出兵攻埇桥，大败而还”。中央命淮南与武宁军作战的目的在于夺取埇桥，打通漕路。在淮南战败的情况下，不得已除愔为徐州团练使^{[12]7586}。但为保护泗水，中央采取了“复置泗濠二州观察使隶淮南”^{[16]1795}的措施。可见，徐泗保护漕运地带，关系唐后期李唐国计，其不能不处心积虑加以控制。咸通三年（875），徐州兵变平定后，中央又废武宁军，“更于宿州置宿、泗都团练观察使”^{[12]8096}。其目的之一也在于肢解武宁军，削弱其实力，减少武宁残余叛军对漕路的威胁。

关于唐代江汉地区的漕运路线，王应麟《困学纪闻》记：“商州上津县，汉长利县。扶风郡，凤翔府。自襄阳取上津路，抵扶风。德宗治上津道，置馆。洋川郡，洋州泝江汉而上，至洋川，陆运至扶风。汴水堙废，漕运自江汉抵梁洋”^[18]。陕虢镇不仅沟通两京，又南邻汉、丹水，故其处于漕粮西入关中和梁洋二州的关键地带。陕虢镇的这种特殊地缘位置，对保护和协助漕运具有重要意义。隋唐时期漕粮西入关中，关键节点在陕虢。隋初，关东漕粮即在陕州小平津陆运，通过崤山道，运到陕州，再循河西运长安^[19]。唐初东南漕粮，依然通过陕虢转漕。自唐后期始，主持漕运官员的一个重要职责，即为整顿陕虢水陆转运。此因陕州以南的崤山运道艰险无比，但又是关中沟通洛阳的必经之路；之外，陕州地处黄河中游，水流湍急，航运艰险，这更凸显了陕州的陆运地位^{[2]35-47}。鉴于此，集中陕虢二州力量，于此置镇，负责调剂漕运，对维持唐后期政权而言关系重大。唐初，陕虢水陆运输整顿较好

时，关东漕粮可大批调入，“唐都长安，故常转漕东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时，水陆漕运，岁不过二十万石”，开元中，裴耀卿整顿陕虢漕运后，“凡三岁，漕七百万石”^{[16]1365}，数目激增。

陕虢地势凶险，为便于将关东漕粮大批运抵关中。玄宗时，专置陕州水陆转运使^{[20]1898}。安史乱后，为强化陕虢镇的转漕和护漕能力，保证漕粮西入关中数量的稳定，中央采取了两种措施：一，广德元年（763），皇甫温任陕州刺史时，“陕西观察使增领虢州”^{[16]1759}。陕虢二州合并，结成藩镇。一方面增强了护卫关中的能力，另一方面集结当镇力量调剂、保护运输；二，安史乱后，陕州水陆运使似已重设。史籍中关于陕州运使乱后复置的情况，始见大历十四年（779）五月，《旧唐书·德宗纪上》记：“（本年，德宗）以江西观察使杜亚为陕州长史，充转运使”。因代宗广德二年（764），漕运即已由刘晏着手整顿，故陕州运使的复设、及陕州镇帅兼任运使的时间，可能还要更早些^[21]。陕州水陆运使设置后，期间因乘舆播迁，中原藩镇悉陷战火，漕粮由江汉转运梁洋，因此期间即使未废，实际上也未发挥作用。贞元十三年四月，于頔为陕虢观察使，重领水陆转运使^{[20]1898}。其运使之名，之所以多以“陆”称，主要因为陕州黄河漕运地段比较凶险，很多时候要靠陆运，而非水运转输资粮。安史乱后，河淮遭叛乱冲击，汴渠航运陷入停滞，河运自然难以为继。

贞元元年（785），唐廷中央急于财货，德宗派李泌节制陕虢，“始凿山开车道至三门，以便饟漕。以劳，进检校礼部尚书。三年，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累封邺县侯”^{[16]4631}。李泌固为德宗亲信，但其得到德宗嘉赏，主要因为其节制陕虢时，主持转漕所取得的骄人成绩：“输东渭桥太仓米至凡百三十万石”^{[16]1365}。开成时，户部侍郎裴休主持陕虢漕事，“自江达渭，运米四十万石。居三岁，米至渭桥百二十万石”^{[16]1365}。当关东形势险恶时，经由陕虢转漕意义更为重要。如《旧唐书·德宗纪》记，建中三年（782）十二月，“李希烈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与朱滔等四盗胶固为逆”。因此两河地区悉陷战火，沿途漕运要路受到严重干扰，以致中断：“（李希烈）遣所亲诣李纳，与谋共袭汴州。纳亦数遣游兵渡汴以迎希烈。由是东南转输者皆不敢由汴渠，自蔡水而上”^{[12]7335}。其后，汴河水路彻底中断。建中四年（783）正月，“李希烈遣其将李克诚袭陷汝州，执别驾李元平。取尉氏（汴州属县），围郑州。希烈使其将封有麟据邓州，南路遂绝，贡献、商旅皆不通。壬寅，诏治上津山路，置邮驿”^{[12]7338}。

之所以开凿上津路，此因正常情况下，如汴宋道绝，漕路须转由江汉，经行陕虢西南，西入汉中。建中三年，李希烈平山南梁崇义后，虽从襄州撤离，但却屯兵邓州。邓州落入李希烈之手，使得中央不仅丧失了南阳盆地，且阻遏了重要的陆运通道——武关道。运路因是改道，即由襄阳溯汉水而上，取道上津。故建中四年（783）正月，德宗诏陕虢治上津山路，以打通运道^{[20]1249}。开凿上津道的关键，在于陕虢镇的努力：“初，希烈自襄阳还，留姚詹戍邓州，贼又得汝，则武关梗绝。帝使陕虢观察使姚明敷治上津道，置馆通南方贡货”^{[16]6437}。

当中原沦为战区时，南方漕运线路不得不转由江汉地区。安史之乱爆发后，为切断唐廷的漕运线路，史朝义分兵东出宋州，淮上战事紧张，江南运道受阻，于是江淮盐铁、租赋、粟帛，乃溯江而上，经由襄阳越汉水，抵达梁洋，陆运至长安。宝应元年（762），肃宗以侍御史穆宁为河南转运租庸盐铁使，寻兼鄂岳镇帅，以总东南贡赋，中央财政得以勉强维持。安史乱后，护卫江汉水运的任务依然艰巨。当中原漕路阻隔时，东南物资常经由江汉，运至汉中，接济关中。中原叛镇因是常着力攻击鄂岳，以求彻底切断江汉漕路，鄂岳镇不得不竭力抵御，《旧唐书·伊慎传》记：“建中末，车驾在梁、洋，盐铁使包佶以金币溯江将进献，次于蕲口。时贼已屠汴州，（李希烈）遣骁将杜少诚将步骑万余来寇黄梅，以绝江道”。在鄂岳将伊慎的阻击下，“贼军大乱，少诚脱身以免，江路遂通”。

其后，为阻断漕路，李希烈令部将坚守鄂岳镇安、随等州，以伺机威胁漕路，不时抄略。《旧唐书·伊慎传》记：第一次，建中时，伊慎包围安州，“贼阻涢水，攻之不能下。希烈遣其甥刘戒虚将骑八千来援，慎分兵迎击，战于应山，擒戒虚，缚示城下，遂开门请罪”；第二次，李希烈遣将援隋州，伊慎“击之于厉乡，走康叔夜，斩首五千级。希烈死，李惠登为贼守隋州，慎飞书招谕，惠登遂以城降”。因常受北方藩镇袭扰，鄂岳等长江中游诸镇时有不宁，“今兵食所资在东南，但楚、越重山复江，自古中原扰则盗先起，宜时遣王以捍镇江淮”^{[16]5767}。加之鄂岳地处长江中游，水网密布，江贼甚多：“鄂岳地囊山带江，处百越、巴、蜀、荆、汉之会，土多群盗，剽行舟，无老幼必尽杀乃已”^{[12]7873}。为此，为保障漕运等交通线路畅通，鄂岳镇需时时防备、不时打击威胁漕路的盗贼。太和五年（831）八月，鄂岳镇帅崔郾“训卒治兵，作蒙冲追讨，岁中，悉诛之（贼盗）”^{[12]7873}。

在保障漕运的初始阶段，东南藩镇也发挥了重

要作用。漕运线路始发江淮，经由宣歙镇，其因此负有保护漕运职责。长庆二年（822）七月，江淮旱，漕河水浅，转运司钱帛委积不能漕，宣州将王国清怂恿士卒哄抢物资，濠州兵谋乱。《旧唐书·窦易直传》记：“先事有告者，（宣歙观察使窦易直）乃收国清下狱。其党数千，大呼入狱中，篡取国清而出之，因欲大剽。易直登楼谓将吏曰：‘能诛为乱者，每获一人，赏十万’。众喜，倒戈击乱党，并擒之。国清等三百余人，皆斩之”。可见，除打击匪贼劫掠，当镇军将见财起心，也是防范的目标之一。

两浙是南方藩镇物资汇集地，又是漕路起点，保护漕运线路和物资安全责无旁贷。建中时，李希烈陷汴州，两浙节度使韩滉遣裨将王栖曜、李长荣、柏良器“以劲卒万人进击，次睢阳，而贼已攻宁陵，栖曜等破走之，漕路无梗，完靖东南，滉功多”^{[16]4435}。德宗播迁梁州后，令李晟、马燧、浑瑊等集兵收复长安，诸军“屯渭北，滉运米馈之，船置十弩以相警捍，贼不能剽”^{[16]4435}。两浙及时、安全地将物资转漕长安，协助中央平叛，对延续唐廷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咸通五年（864），懿宗调兵镇压南蛮叛乱。湖南、桂管等诸镇是漕粮经由之地，其多次出动吏民协运：“西戎款附，北狄怀柔，独唯南蛮，奸宄不率。侵陷交趾，突犯郎宁。骚动黎元，疲力飞輶。如闻湖南、桂州，是岭路系口，诸道兵马纲运，无不经过，顿递供承，动多差配，凋伤转甚，宜有特恩。其江陵、江西、鄂州三道，比于潭、桂，徭配稍简，宜令本道观察使详其闲剧，准此例与置本钱”^[22]。漕粮经过当道时，一方面藩镇要集中人力协助转运；另一方面，自要派兵确保漕运线路和物资安全。因此，对诸镇的功劳，中央赐钱饷馈，以示褒奖。

代宗时，李勉为江西观察使，署李芃为判官。《旧唐书·李芃传》记：“时宣、饶二州人方清、陈庄聚众据山洞，西绝江路，劫商旅以为乱。芃乃请于秋浦置州，守其要地，以破其谋。李勉然其计，以闻，代宗嘉之，以宣州之秋浦、青阳、饶州之至德置池州焉”。江西通过增置州郡的方式，增强当镇防御力量，保证了江路畅通。建中时，李希烈反。为保护江西和漕运，湖南观察使李皋调任江西节度使，多次与李希烈发生激战。为遏制李希烈占据江淮，切断漕运源头，江西镇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次，李皋与李希烈隔江而战，大败之。“会与贼夹江阵，皋勉慎立功，以所乘马及其铠赐之，使将先锋，斩贼数百级，乃免”；第二次，夺取李希烈蕲、黄二州。“皋声言西取蕲，引兵舰循崖溯江上。皋遣步士悉登舟，顺流下，攻蔡山，拔之。间一日，贼救至，

遂大败，乃取蕲州，降其将李良，平黄州，兵益振”；第三次，驻防永安，打通江道。“天子狩奉天，盐铁使包佶为陈少游所窘，以运艚溯江，次蕲口，希烈使杜少诚将步骑三万将绝江道，皋遣伊慎兵七千御于永安，走之。以功进工部尚书。帝驻梁州，皋之贡助相望”。因打退李希烈的多次进攻，史称李皋“西道出九江，至大别，皆与贼接，皋转战数千里，饷路遂通，江汉倚皋为固”^{[16]3580}。

史念海先生认为唐代漕运高潮为玄宗时，元和后因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发生变化，西入关中漕运量渐少^[23]。如“（元和）初，江淮米至渭桥者才二十万斛”^{[16]1365}，较之贞元时，年运江淮米最高七十万斛^[24]，数量仍有大幅下降。但对其原因，史先生并未指明。宋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指出：“唐中睿以后，府兵之法坏，聚兵既多，所以漕运不得不详。大抵这两事常相为消长，兵与漕运常相关”^[25]。玄宗时西北边兵甚多，自需漕运大量粮食入关。此后，随着吐蕃、回鹘的逐渐衰落，西北边患渐轻，屯兵不多，所需漕粮自然减少。建中时，出于平叛和收复关中的需要，大量漕米西入关中。宪宗平吴蜀河朔，只需将漕粮直输战场即可，无需入关。此后历朝，战乱虽多，但主战场不在关中，所需漕粮更无需西运关中。但不可否认的是，唐后期政治和经济依赖中心的分离，使漕运成为中央政治统治的根本。漕运不仅维系关中政治集团的运转，而且是应对各种战事的物质后盾。宋人张方平《乐全集》称：“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26]。漕运对整个国家的稳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故唐人吕温也说：“天宝之后，中原释耒，辇越而衣，漕而食”^{[8]4745}。

三、结语

唐后期，中央“以江淮为国命”^{[8]3390}，淮南、两浙、襄、邓、徐、蔡等“江淮诸州，业在田亩，每一岁善熟，则旁资数道。赋取所资，漕挽所出，军国大计，仰于江淮”^[27]。其原因在于：“吴、越、闽、蜀之田，在古为瘠薄，在今为膏腴，由人功之修治。今天下之田称沃衍者，莫如吴、越、闽、蜀。其一亩所出，视它州辄数倍”^[28]。加之江淮水网密布，便于运输，故“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29]。诸道通过漕运资粮西入关中，虽无兵兴之际运量那般大，却是源源不断的。唐末大乱，中央威权不行，中原藩镇多有首鼠两端者，但南方诸镇直至唐亡前，大都贡献不断。中原虽然纷扰，南方漕运通过江汉路线，并未完全受到阻隔。为此，对境内漕路等交通线的保护，也是经由诸镇

职责所在。漕运关系国计，又因地方形势的混乱，对漕运线路构成了威胁，因而保卫漕运是诸镇的重要职责。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变衰的转折点，动乱后，唐王朝却依然维持了近一个半世纪的统治，其中原因多样。相关诸镇对中央赖以生存的漕运线路保护的基本得力，应是其中原因之一。

[参 考 文 献]

- [1] 王树民. 廿二史札记校证[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429—430.
- [2] 史念海. 三门峡与古代漕运[J]. 人文杂志, 1960, (4): 35—47.
- [3] 潘鏞. 中晚唐漕运史略[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1986 (1): 16—22.
- [4] 吴立余. 略论元和初期李巽的盐法漕运改革[J]. 清华大学学报, 1986, (2): 87—97.
- [5] 吴琦.“漕运”辨义[J]. 中国农史, 1996, (4): 65—66.
- [6] 王夫之. 读通鉴论[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786.
- [7] 陈寅恪.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1: 204.
- [8] 李昉. 文苑英华[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6.
- [9] 崔瑞德. 剑桥中国隋唐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493.
- [10] 王应麟. 玉海[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
- [11] 董诰. 全唐文[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12]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 [13] 杜牧. 樊川文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 [14] 杜佑. 通典[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248.
- [15] 杨希义. 略论唐代的漕运[J]. 中国史研究, 1984, (2): 53—66.
- [16] 欧阳修. 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17] 马其昶. 韩昌黎文集校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474.
- [18] 王应麟. 困学纪闻[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1807.
- [19] 魏征. 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671.
- [20] 王溥. 唐会要[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 [21] 吴廷燮. 唐方镇年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380—382.
- [22] 宋敏求. 唐大诏令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510.
- [23] 史念海. 河山集[M]. 北京: 三联书店, 1963: 208.
- [24] 刘昫.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3518.
- [25] 吕祖谦. 历代制度详说[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24.
- [26] 张方平. 乐全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125.
- [27] 权载之. 权载之文集[M]. 上海: 上海书店, 1989.
- [28] 章汝愚. 群书考索续集[M].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2: 236.
- [29] 李吉甫. 元和郡县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29.

(责任编辑: 闫卫平)

On Military Governor's Protection for Grain Transporting in Late Tang Dynasty

LI Zhi-gang

(History Institute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An Shi rebellion, the rebels quickly occupied areas along the banks of Yellow River, and other wide areas such as Chang'an, Luoyang, etc. The transport route was in danger. Therefore, the vassal states did some protection work to the canal, which made supplies in areas along Yangtze and Huaihe Rivers continuously transported to the central and supported the counterinsurgency war in Central. After the Anshi Rebellion, for a certain period time, it still remained an important task of Tang Dynasty military governors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transport routes due to that parts of water transport routes were still controlled by the rebels. In late Tang Dynasty, vassal states were basically effective on the protection of water transport lines, which efficiently made a contribution to the continuation of Tang dynasty.

Key words: Tang Dynasty; Tang Dynasty Military Governors; Grain Transportation; Protection